



深度 异乡人

异乡人——邹思聪：时代剧变了，而我们都要设法活下去

在我们读书那些年，谁会理会罗振宇是谁，马东是谁呢？最受媒体关注、得到追捧的，即便不是许知远这类知识分子，也是许知远当年批判的人，因为“庸众的胜利”而捧起来的韩寒。

2017-09-03



就是这样，对于有的人来说，他们获得了符合时代价值的成功，对于更多人来说，没有胜利可言。但对更大的剧变时代来说，弄潮儿与消逝者都并不特殊，能活着就已是一切。摄：林振东/端传媒

大概是三年前，查建英的《弄潮儿》被牛津出版社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大受非虚构爱好者欢迎。所以今年，她那本1990年代的旧作《中国波普》（*China Pop*）也被翻译成中文，同样是牛津出版。此前许多年，中国大陆出版社想以删节版的方式出版此书，都被查建英一口回绝。

我对《中国波普》第一章的某段话印象尤为深刻。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那批去美国留学，并且长期从事双语写作的作家，查建英到底如何——我都不太想说是“定义”——审视和感受自己的身份、目标读者与中国写作本身？

查建英说，她的认同感是双重的，对太平洋两岸不同的人和文化理念，都同样心怀敬重与忠诚，“每当有人问我，我究竟是如何定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文化立场，我的回答往往是：我一只脚搁在中国，一只脚搁在美国，脑袋则搁在中美之间的某个地方，兴许是香港。”

她应该熟知香港的变化。读这本书时，我老想起《弄潮儿》刚在香港出版那年。当时还在浸会大学念新闻学硕士的许冰清迅速买来了，我们一起吃糖水时，她小心翼翼地捧着这本书——牛津的书都是封面特别精致的，她捧着那本书，擦拭抚摸，如同信徒捧着圣经一般。我借过来翻阅，第一篇就是我非常熟悉的那篇《国家的敌人》，写的是查建英的哥哥，我之前已经反复读过。

除了国家的敌人，查建英紧接着写了国家的仆人。写的是王蒙，查建英年轻时候的朋友。这大概是那本书写得最好的两篇文章。几年来，当记者，写别人、事件和观点，我逐渐认同一切写作都是自传，人只有写自己的时候才是写得最好的，连查建英也不例外。

那天，我和许冰清还一起在港大参加一个seminar，北大新传的徐泓院长，她的学生、当时《博客天下》的总编助理、新媒体“咋整”创始人陈鸣也来了。我们马上要毕业的几个学生，跟学界和业界前辈请教如何写报导，如何看待中国新闻业，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写文章。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片段，只记得当时是快要毕业了，我们聊起未来的打算。许冰清坚定地说自己要回上海，我说我应该会留在香港工作吧。

她当时对我说，“BAT（编按：指代巨型网路企业）大有前景。”

这句话我当时没有太放在心上，但这几年就老想起这句话。正如后来我刚去北京时，我的编剧朋友张高兴就对我说，“在北京没有钱，就很没有安全感”。我是一年之后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我后来留在香港，许冰清也回了上海，几年来我们居然再也没见过一次，逐渐成了朋友圈和微信对话框里的网友。我入职《亚洲周刊》，离职，去了端传媒，又离职，去了北京，再离职，最终回来，做起了口述史。我也看着她去了好奇心日报，离职，后来又回去，继续在好奇心日报做主笔，前段时间又再离职，休息一段时间……

这几年，目睹中国其他媒体纷纷衰落，好奇心日报、品玩、虎嗅、36氪、钛媒体等泛科技类媒体都越做越大，融的钱也越来越多，我开始觉得她当时的眼光确实很准，比那时候我见过的许多媒体总编、资深记者的眼光都要准。四年下来，在中国还能做的报导，还能产生一点行业影响力的，差不多就是这一块儿了。

我突然意识到，那一天的其他老师呢？

陈鸣是因为《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中的种种事情，愤而离开南周的。彼时在《博客天下》，他又将“咋整”做得风生水起，不久后，他彻底进入商业社会，开始了连续创业与VC合伙人之路。

徐泓院长从北大新传退休后，在北大深圳校区继续开办财经新闻系。当日邀请徐泓老师来港大的钱钢老师，也受邀去给财经新闻系的学生讲新闻史。钱老师后来说，财经新闻系的学生一开始不能理解，自己想学的是财经新闻，为何要去追索当代历史？直到后来，许多学生对父母生日当天的报纸及背后的历史，终于产生兴趣——看清自己所处的历史座标，从何而来，将往何处，太重要了。

钱钢老师仍然在港大做研究和教学，眼看着都已经到2017—2018级的学生了。而筚路蓝缕、建立港大新闻学院的陈婉莹院长，已经退休了。陈院长退休的消息传来那天，我正在

端传媒的办公室工作，不由得感到某种情结和价值的彻底终结。曾经在我们学生中流传的一句话是，“院长是不会退休的”。

作为一个制度主义者，我仍然觉得，不同的人的制度之中能够做的事情，是绝对不一样的，有些人和他们能做的事情，就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所以我至今看到陈院长，仍然会紧张。前几天在港大校园里看到她，我跟她打招呼，聊起天来，她照例把我批评了一番，我红着脸点头。

那时候我突然又想起陈院长以前老对我说的，“你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你要从书本到实践，再到书本”，“香港太小啦，你要去缅甸，去马来西亚，去全世界啊！”其实这几年，我都深刻地背负着这些批评，也自认为尽量没太辜负这几句教诲。只是我确实走得很慢，也很挣扎。

那天相遇的最后，她笑着对我说，“你倒是越长越年轻了嘛！”我哈哈一笑，心想自己不像院长老挂在嘴边的张洁平、张倩焯，这大概是院长对我唯一的夸奖了吧。

我唯一后悔的事情，就是无法成为别人

查建英的《弄潮儿》出版前，许知远的新书《抗争者》在香港和台湾都出版了。同样的，在那本书没出版以前，大部分文章我也都读过了——

许知远在FT中文网的专栏，我以前每期都会看。他每一篇文章唯一让我不适的，就是文末必有的“……”我觉得省略号每每让整篇文章显得拖泥带水，真正有逼格的是文末的句号。

那时候，许知远写今年7月刚刚去世的刘晓波，题目是“受困的黑马”；写当年他亲睹、跟随、交流和学习的北大三杰——余杰、孔庆东、摩罗的事情，那应该是我见过的写这几个人恩怨变迁最好的文章。这可能也印证了我那句话，最好的文章全是自传。

他还写了“温柔的流亡者”王丹，王丹本来在Facebook上转发过这篇文章，表示“许知远写我的文笔，比我本人更温柔”。但令人奇怪的是，后来王丹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又批评了许知远，大意是“我本来以为他会写得很客观，结果他写成了文艺青年的抒情”……这让我一直不得其解。

可以看到，在那本书中，许知远不只写大陆，也写台湾的抗争者，还写香港的抗争者，乃至于其他国家的抗争者……他自己本人，也站上过抗争最前线的乌坎——写那些在现实抗争中并不知名的“小人物”。

从那时起，我开始注意到，他的文章中有从未停止流露的一种东西，就是对自我的不断审视，并且无休止地谴责自己。或许是因为他的这些朋友、采访对象，许多都遭遇了相当不幸的打压，从肉体到精神——我已经记不清原话了，他大概是说，自己因为不想基本的生活自由受到干扰，不想被跟踪、骚扰和威胁，所以他不敢再进一步。

当许知远直面自己的软弱时，对比他那些勇敢而不合时宜的聊天谈话对象，他没有自得于能自如游走于边缘地带、没有“隐微写作”、“打擦边球”的智力优越感，而是对自己的懦弱感到无比羞愧与自责。但他也确实做不到更进一步。

即便如此，和所有在上个时代获得名声与价值的知识分子、作家一样，许知远的作品在这几年遭遇过风声鹤唳的封禁。2014年深秋，我在香港《亚洲周刊》做记者，那天我到处打国内书店和出版商的电话，询问余英时、许知远、梁文道、九把刀等人的书是不是都下架了。

后来我在端传媒工作时，许知远是专栏作家。我编过一篇他的专栏，他也提到了这件事，其中这么写道：

记忆里那天阴沉压抑，我正坐在北京一家咖啡馆里，等待从昨夜的宿醉中醒来。搞不清窗外的暗淡天气，是缘自风沙还是浓重的雾霾。这是2014年11月的一个星期六。

电话响起，我的朋友说，你上了被查禁作家的名单。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我的名字与历史学家余英时、经济学家茅于軾、散文作家野夫、香港电视主持人梁文道，还有一位台湾青春片导演九把刀并列在一起。根据一位参与了广电总局最近一次会议的参加者在微博上披露说，我们的书籍要么不再允许售卖、要么被不再被允许出版。

接下的几天，我收到了各式的电话、邮件，它们有的来自朋友，有的来是记者，他们问我被禁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得到了相关的通知，我对此又有何感受？

这些询问让我哭笑不得，与他们一样，我也是从社交媒体上得知这一消息的。从没有官方的版本确认或是否认这一消息，更没有审查部门的某个具体文件、个人或是电话来通知我。

但你又知道这消息不会是空穴来风。



在那篇专栏里，许知远照例剖析并谴责自己，文章最末，许知远写道，“我为自己的胆怯感到屈辱与羞愧。我第一次开始尝试写日记，记录下内心的分裂，期待书写能平抚它……”

与最早作为读者阅读他的文章一样，每次编他的文章时，我同样非常感慨，这个人这么多年，都没有太大改变。他的文章里那种自我谴责，对自己懦弱的剖析，非常真诚，非常罕见。和他拿腔拿调的，欧化译文般的，相当自恋的文笔形成一种奇怪的张力。而且他不要稿费，总是都让我把稿费打给我的总编张洁平，这也让我们相当尴尬。

我于是不由得想起读大学那阵子，我们在学校里办独立杂志，非常自得于作为学生，我们可以屡次采访大咖——有一次，熊培云、许知远、梁文道同时出席成都西西弗书店的活动，出版方配合当时上映的电影，起了个“云知道”的名字做宣传。

熊培云非常谦逊，梁文道特别友善，只有许知远，对我们这帮人，可以说是不屑一顾。

我们杂志的传统是，每次采访都让采访对象写一句话给我们。

熊培云写的是祝福学生的话，而梁文道写的是“士不可以不弘毅”。我知道那是为什么。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念书时，有幸听到钱穆的演讲，这是钱穆告诉他的话。

知道许知远写的是什么呢？我当时惴惴不安地把那个笔记本递给他，他一开始是不屑，随后他用很潦草的笔记写道：“不要寻找愚蠢的他人意见。”

那句话我琢磨许久，不是他人的愚蠢意见，是愚蠢的他人意见。我后来和当时我们杂志的主编讨论，这句话别有深意，在他眼中，他人意见都是愚蠢的。

因为有大学时代他那不屑一顾的一面之缘，到后来，我一直对他都有种不可接近感。但去年我在北京时，没想到许知远居然会发微信，想我去谈一谈，能否去《单读》做编辑。

但当时我已经加入另外一个VC（创投），和陈鸣做了同事，我说是想去资本圈长长见识，好让我以后有写作素材，但同时，也是因为时代剧变，我不得不在其中，变换各种姿势，闪转腾挪，避免被碾压致死罢了。

后来有段时间，我辞了职，在北京过上（不）自由撰稿人的生活，经常去朝阳大悦城的单向空间读书写文章。私底下，我会常怀遗憾。要是我去了会怎么样呢？我是《单读》（之前的《单向街》）八年的读者了，离开北京时，我还带了《单读》当时最新的一本《世界的水手》。在这个时代能够经常和那些热爱文学的人打交道，应该已经是能想到的最好的事情了吧。

每当那时候，我一般会刻意想想《单读》的编辑吐槽过的许知远，并用伍迪·艾伦的话安慰自己，“我唯一后悔的事情，就是无法成为别人。”

不知你如何，我真的苍老和成熟许多

因为总在折腾，因此我理解他人，也老先审视自己的选择与挣扎。这样我去看待别人，会觉得许多事情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好像必须如此。

在我们读书那些年，谁会理会罗振宇是谁，马东是谁呢？最受媒体关注、得到追捧的，即便不是许知远这类知识分子，也是许知远当年批判的人，因为“庸众的胜利”而捧起来的韩寒。

到今天，韩寒去拍电影好几年了，独唱团已如同上个世纪的事情，“一个就够了”的ONE，也开始做起了非虚构实验室，总监是上个时代大名鼎鼎的李海鹏——现在他已经几乎不写文章。批判韩寒是“庸众的胜利”的许知远，我猜他想不到，他所鄙视的“庸众”，这么快就一

溃千里。他现在会不会像茨威格一样，终于开始怀念昨日的世界？看《十三邀》这档节目时，我总感觉这是他与这些时代弄潮儿的困惑对撞，又是他勉力维持的某种难堪的幻象。

“罗辑思维”早已妇孺皆知了，我的朋友圈里仍然有前个时代的“遗老遗少”在喋喋不休，说罗振宇的许多节目，不过是拾当年“辉格”的牙慧。问题是，这个时代的人会问，辉格？他是谁啊？

可能还有一些辉格的老粉丝，比如说大象公会的“魔鬼教官”黄章晋，他在新媒体时代做出了不错的转型，还在用大象公会的平台，为辉格摇旗呐喊。罗永浩可能还会在锤子手机的发布会上，说黄章晋是他的偶像，是这个时代的鲁迅——但锤子手机这个时代的关注者，他们会问黄章晋是谁啊？魅族的总裁不应该叫黄章才对吗？

所以我这样笨拙的人尚且明白的事情，许知远他们怎么不明白：时代真的变了。

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时代是在什么时候变的？以什么样的方式变的？我昨晚睡前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觉得，大概就是在人们睡觉的时候变的吧。

在所有人们睡觉的时候，韩寒被认为是“代笔”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出来了，要舆论斗争的决定做出来了，微博原来的捧大V模式彻底毁灭了，微博赴美上市、决定全面娱乐化了，微信公号的第一个十万粉公号出现了，微信十条出来了，南方报业的所有报纸都衰落了，上海报业突然异军突起了，知识付费兴起了，IP兴起了，Papi酱火了，被罗振宇投资炒作后、又不那么火了，被《人民日报》批判了，VR兴起了，VR寒冬了，风口来了，资本寒冬了，生态化反了，老板又跑了，网络安全法草案公示了、人大通过了、正式实施了，一大批娱乐账号被关了，同性恋、婚外情不能写了，综艺节目里那些染发艺人的头上都马赛克了……

在所有人们睡觉的时候，这些变化都发生了。到反应过来时，给人的直接感觉是，这世界就一颗洋葱，正在被一层层剥掉，长出来的一些东西，在公共媒体上，有的人叫好，有的人鄙视，有的人迅速收获新的名利，有的人陨落般荡然无踪。

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像是在玩一盘Hard模式的沙盘游戏，完全没时间和精力，像上世纪1980年代那样去感慨，“为何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只能变换自己的姿势、更新自己的大脑、改变自己习惯的说话方式，马不停蹄向前。

罗振宇、马东在一个新时代崛起，许知远努力保持着自己固执装逼的拿腔拿调，但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逃不开时代，不得不变换各种姿势，在北京闪转腾挪……

马东和罗振宇离开央视，一个策划了奇葩说，一个开发了逻辑思维和得到，许知远居然也做起来视频节目《十三邀》，他的老朋友梁文道则从《开卷八分钟》做到了《一千零一夜》，还是介绍书，只是从传统媒体跳到了互联网平台——但真正被人关注的不再是他，而是曾经的民谣音乐人高晓松。

大象公会的黄章晋也想做视频很久了，拖延症许久，直到最近刘大可的“混乱博物馆”做起来……徐达内前两天在朋友圈还发了个关于《媒体札记》的回忆，但离我们这代人每天看《媒体札记》的时代，已经过去四年了；媒体札记命途多变，辗转之下，变成了“媒记”，和那个“亦庄亦谐”、每日记录评析最热新闻事件的知名专栏，早已天壤之别，而是变成了“新榜”的副产品……

清晰的图景已经展开了：活跃在上个时代的那些人，有的转身，有的闭嘴，有的进去，有的死去，有的离开；当然，有的随风起舞，有的兜售繁荣，有的计划经济，有的共产主义。

但这样分野清晰的巨流河，居然会给人一种错觉，1920年代的爵士美国和1930年代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是不是在这个时代合体了，以至于这番奇异的清晰景象，根本就无法清晰优美地描述。

但重点是所有人都得继续活下去，想方设法地活下去。

是的，所有人都得想法设法活下去，包括在上个时代已经功成名就的人，在这个时代要继续活着，也一定有生怕被时代挤掉的危机感。弄潮儿永远惧怕的，是自己不再弄潮。

而我身边更年轻的朋友不是这样。

曾经写下《国家就在你脚下》的元湓恭不是这样，我目睹他这些年，欣喜他告别歧途、回归金融街，又前往BAT，终于年薪百万，也唏嘘他这些年的细微变化与深深失落。

曾经在伊利诺伊香槟分校开办“非虚构写作”公号的卓星不是这样，他喜欢特稿、热爱写作，从《财新》到《人物》，辗转新媒体和金融机构，最终回归体制，走上正道，却依然长久地为写不出稿而抑郁。

大学期间卧底富士康、屡获南都新闻奖的刘志毅不是这样，他从清华研究生毕业后入职南方周末，目前在今日头条负责媒体实验室，却在我们一次喝酒后说最喜欢的工作，仍然是做特稿和调查记者，但这一行已经没人了，“只能说生不逢时吧”。

我和许冰清也不是这样。我们那时候引为同道的一帮人，一开始是想效仿前人，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能够做接受过更好训练的记录者。那时候她抚摸擦拭的《弄潮儿》那本书，今天看起来，除了国家的敌人更多了，国家的仆人被淘汰了，其中提到的那些“好大亨”，地位也讳莫如深，未来难以预料。

今年在香港出版的这本《中国波普》，最有价值的是那些90年代具体故事，而其中某些微妙的美好期盼，看起来更大程度上是失效了。形形色色的“弄潮儿”是这个时代的短暂主角，但《弄潮儿》绝对不再可能是图书出版业的主角，哪怕是在香港。

前不久，批判许知远的那篇爆款文章说，许知远不懂90后。其实我和我的这些朋友，都是90后，更是后89一代，在查建英笔下那个“提高了的物质水平”、“文化政治方面有所松动”、“消解了的旧有意识形态的大一统局面”、“生长了的市民社会，拓展了的个人自由和流动上升空间”的时代中成长起来，只是我们更迅速地衰老、失却少年感而已。

那个写文章批判许知远的90后，可能是更年轻的95后吧。只是当他／她不必再使用许多宏大抽象的词汇认识世界，不再引用齐泽克等人以后，可能会更明白一些，在时代剧变下，90后没什么特殊的，95后没什么特殊的，00后也没什么特殊的。

突然想起来，前段我在旅途中，给前总编张洁平写了一张明信片，其中有一段写道：

“这些年回想起来不过三四年，但总觉得漫长如永恒，我们在其中坚持也改变，相信和怀疑，实现与挣扎……不知你如何，我真的苍老和成熟许多。”

就是这样，对于有的人来说，他们获得了符合时代价值的成功，对于更多人来说，没有胜利可言。但对更大的剧变时代来说，弄潮儿与消逝者都并不特殊，能活着就已是一切。

（邹思聪，自由撰稿人，书评人）

评论

邹思聪

异乡人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3. 烛光集会，李兰菊发言：30年记住所有细节，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6.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7.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8.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9.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添华夏恸现场重组：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2. 陆委会港澳处长：“杀人案演变成进退失据，港府要负完全责任。”
3.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4.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5.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6. 李峻嶒：无大台、去中心化和“三罢”，能帮“反送中运动”走多远？
7. 核廢何去何從？瑞典過了47年，仍在繼續爭論.....
8. 这些香港老板响应罢市，休息一天

9. 香港酝酿前所未有的政治性罢工，老板和打工仔会连成一线吗？

10. 法梦：新西兰上诉庭判决指，中国有系统性的苛待被告和囚犯情况

延伸阅读

异乡人——胡清心：香港，我和你，在最美好的时间点相遇

我无法想像现在来港就读的陆生是否还能保持我当年的心境，对他们而言，来到香港是进入一场硝烟弥漫的战场的最前线。

异乡人——杨静：我在香港八年，搬了十次家

在有 Airbnb 之前，我已经养成类似习惯：在本地房屋租赁网站上像看色情片一样看我租不起的单位……

异乡人——胡清心：异议者的修炼，是坚持跟内心黑暗打仗

从保守右倾，到激进左倾，再回到更坚定的保守右倾，是不少陆生不愿提起的心路历程。

异乡人——陆颖鱼：旅行中的台湾和移民中的台湾是两件事

嫁到台湾后，香港女生陆颖鱼离开了媒体业，一番折腾摸索，今年才在台北巷弄里开了书店“诗生活”，对于她，香港人梦想中的台北是什么？

异乡人——他从战地来，想在台湾说什么样的故事？

“在我的家乡，有36万族人因为恐怖攻击成为难民，有3000多人被推下海，人们被迫在改信回教与死路一条中做出抉择。在我的家乡，因为ISIS的关系，儿童变成了孤儿、年轻妇女变成性奴隶，还有小孩被洗脑成会杀人的恐怖分子……。”